

三国演义



词鉴赏

郑铁生 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三国演义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词鉴赏

郑铁生 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国演义诗词鉴赏/郑铁生著.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3. 1

ISBN 7—80504—930—0

I. 三... II. 郑... III. ①《三国演义》研究②诗词—文学欣赏—中国—明代 IV. I207.4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2892 号

三国演义诗词鉴赏

郑铁生/著

出版人/刘文君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 300020)

天津市房地产管理局印刷所印刷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6.5 字数 420000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504—930—0/I

定 价:32.00

修订版说明

《三国演义诗词鉴赏》，1995年3月由北京出版社出版以来，至今已八年了。去年台湾一家出版社准备再版，便激起我修订的念头，如今总算付诸实践了。此次修订大体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的。

一、原著体例分“注释”、“说明”和“赏析”三部分。由于“说明”与“赏析”有重合的部分，修订时将“说明”这一部分删掉了，其中还有必要保留的则溶于“赏析”之中。

二、将全部的“注释”进行校理，对其中一部分注释条目进行了充实，个别有错误的地方也做了纠正。同时，又增补了六十一个注释条目。

三、“赏析”部分大改的约有二十多篇，其他都做了内容补充、层次调整、文字精炼。总之，力求精美。

四、增添了外文目录和人物索引。

作者

2002年3月10日

再版序言

陈 辽

在当前人文科学著作出书难的情况下，郑铁生教授（以下直呼其名）的《三国演义诗词鉴赏》（以下简称《鉴赏》），在1995年出版以后应读者要求出增订版，说明它是一部雅俗共赏、备受欢迎的佳著。

《三国演义》中的诗词并不是没有人赏析过，但他们只是对其中的某些诗词的思想和艺术加以赏析，却不曾有人像郑铁生这样对《三国演义》中的全部诗词进行鉴赏。这是前人不曾做过的开辟草莱的工作。单凭这一点，郑铁生已经对《三国演义》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鉴赏》的意义绝不限于它填补了《三国演义》研究中的一个空白，更在于它提供了如何深入研究中国古代小说中的诗词的一条新思路。

《鉴赏》作者不是孤立地研究《三国演义》中的诗词，而是把它们视为《三国演义》整体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从唐代主要宣讲佛经的说唱文学“变文”、“俗讲”起，发展到宋代的“说话”，我国古代通俗小说历来就有叙说和歌唱、散文和韵文相间的传统。《三国演义》也是这样。罗贯中创作的《三国演义》原本虽已佚失，但从《三国志通俗演义》、《三国志传》的多种版本中都有大量诗词看出，罗氏《三国演义》原本里即有大量诗词是可以确定无疑的。及至毛纶、毛宗岗父子加工、整理、修改后的《三国演义》问世，书中的诗词还有二百多首。《三国演义》里的诗词有三种情况：一为罗氏原本中的原创；二为后来的整理、加工者的创作；三为对前人叙写、评论三国人物和事件的优秀诗词的引用。毛本《三国演义》里的诗词，一方面是上述三种诗词佳

构的集大成；另一方面，它也删去了若干毛氏父子认为水平不高的诗词。由于毛本《三国演义》有“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发展观；有明确的“帝蜀寇魏”的思想倾向，有审美精妙的批评方法（毛宗岗《读三国志法》），因此，毛本《三国演义》中的诗词，即便是三国以后历代诗人创作的有关三国人物和事件的诗词（如第一百零四回、第一百零五回中杜甫、白居易追念、讴歌诸葛亮的诗作），也都已成了毛本《三国演义》整体构思中的一部分。郑铁生从《三国演义》诗词与《三国演义》是一个整体的《三国演义》诗词观出发，所以他的赏析中便能道出惟他独有、别人所无的新意。《三国演义》卷首词的《临江仙·滚滚长江》，本是明代文学家杨慎晚年所作，与三国无关，但毛本《三国演义》引述它置之卷首，于是这首《临江仙》便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郑铁生认为，这首词“表现了怀古伤今、感慨兴亡的情思”；“创造了一种清空的意境”；“这不是个人的感受，这是历史的氛围、历史的情绪、历史的格调”，所以“借用杨慎这首词作为《三国演义》的卷首词，来涵盖《三国演义》的蕴意是十分恰当的”。如此赏析《临江仙》，它就不仅是杨慎的《历代史略词话》中的一首好词，而是《三国演义》整体的一部分，由此引出了“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发展观，也就十分自然了。第一百十三回中的诗《孙琳废主》：“乱贼诬伊尹，奸臣冒霍光。可怜聪明主，不得莅朝堂。”写的是孙琳以昏乱无道之名，将聪明的年方十六岁的吴国君主孙亮废掉，这是关系吴国后来历史命运的一件大事。诗的艺术性不算很高，但郑铁生却在赏析中一语道破了这一历史悲剧的根源：“究其原因，是孙权晚年错乱的家庭和立嗣的更迭留下的后遗症，殃及子孙。”这也是郑铁生将《三国演义》诗词和《三国演义》作为一个整体后对《孙琳废主》一诗做出的新阐发。

《红楼梦》中的诗词也很多，赏析《红楼梦》诗词的著作也不少。但这些著作对《红楼梦》诗词的赏析，多采取“仰视”的

视角，把《红楼梦》中的诗词说成篇篇锦绣，字字珠玑。这就脱离了《红楼梦》的实际，成了溢美之辞。事实上，《红楼梦》中的诗词，佳作不少，但也有一些平庸之作，有的还含有封建糟粕，不能一概好评。《鉴赏》的作者不是这样，他站在今人的高度，时代的高度，对《三国演义》中的诗词，采取的是“平视”或“俯视”的视角。好处说好，不足处说不足，有糟粕处说糟粕。第六十一回有《荀彧之死》一诗：“文若才华天下闻，可怜失足在权门，后人休把留侯比，临没无颜见汉君。”诗作者出于“帝蜀寇魏”的政治立场，说荀彧为曹操出谋划策是“失足”，临没时“无颜见汉君”。郑铁生对此做了批评：“诗中说荀彧‘失足’”，这种看法“失之浅薄”。“他辅佐曹操征戈，是为了结束动乱，复兴汉室”；“他不图私利，不慕富贵，表现出了封建社会一位知识分子可贵的操守”，怎能因为他追随曹操，就说他“失足”呢？至于荀彧之死是由于他的“正统观念和思想意趣”与曹操有别，以及“他对曹操为人的深透了解，使他选择了宁愿玉碎、不愿瓦全”的服毒自杀的方式。但他的死“并没有改变曹操进爵魏公、进逼汉室的野心”，他死得很清醒，也很痛苦，绝不是“临没无颜见汉君”。类似的“平视”或“俯视”的视角赏析《三国演义》诗词的文字在《鉴赏》中很多，所以郑铁生的《鉴赏》比之那些《红楼梦》诗词赏析显得高出一头。

采用多种批评方法，对《三国演义》诗词进行赏析，是《鉴赏》的又一特色。批评方法应与批评对象相一致。因为《三国演义》是一部叙事作品，是一部历史小说，而《三国演义》中的诗词又是《三国演义》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郑铁生对《三国演义》诗词的赏析，大多采用叙事学的方法（他曾有专著《三国演义叙事艺术》出版）、历史的方法，这是他最得心应手的。但郑铁生又从不同诗词的实际情况出发，以多种批评方法赏析《三国演义》中的诗词。如用比较的方法，比较《杨修之死》这首诗嘉靖本与毛氏本的某些不同；以文化学的方法赏析《赞管

轶》；以点评的方法，逐句点评《水淹七军》；以系统的方法评论曹操杀死伏皇后及其家族后毛宗岗一连增加三首诗，把它们作为一个系统予以赏析；等等。由于《鉴赏》采用了多种批评方法赏析《三国演义》诗词，有时候综合应用两种或三种批评方法赏析《三国演义》诗词（如对赤壁之战中诗词的赏析），因此更增强了《鉴赏》的艺术深度和力度。

自然，《三国演义》诗词的艺术性，更是《鉴赏》的用力所在，着眼所在。《三国演义》中的诗词，大致可分以下几类：写景诗（如《卧龙居处》）；状物诗（如写铜雀台的《铜雀台赋》）；抒情诗（如《徐庶唱歌词》）；叙事诗（如《马跃檀溪》）；描人诗（如《浣溪沙·貂蝉》）；人物评价诗（如《蜀相》）；事件评价诗（如《义释曹操》）；政论诗（如《三国归晋》）。对于上述不同类型的诗词，郑铁生正是抓住这些诗词内蕴的不同的艺术特点，道出它们的艺术奥秘所在。如评论《咏怀古迹五首（其五）》的艺术时，说“全诗从进祠、瞻像、叙事，层层推进，如大江东去，波奔浪涌，激情喷发”；“他用悲怆的笔摇曳多姿地描写诸葛亮临终之时，或对答、或嘱托、或遗书，字字含泪，声声带悲”。如此艺术分析，可谓入木三分，曲尽其妙。

也许是因为要赏析的《三国演义》诗词达二百多首，而文学批评的用语有限，所以《鉴赏》中的有些赏析话语有所重复。假如能消解这一缺点，《鉴赏》一定会得到更多读者的欢迎。如果不是我记忆有误的话，郑铁生已有《三国演义艺术欣赏》和《三国演义叙事艺术》，连同这部《三国演义诗词鉴赏》，他的《三国演义》研究著作已有三大部了。郑铁生还在中年，来日方长，我预祝他今后在《三国演义》研究中取得更新更大的成就！

2002年5月于南京

（陈辽 著名评论家。原江苏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研究员
兼《明清小说研究》主编）

填补空缺的新作（序）

鲁德才

记得1990年2月，郑铁生同志托一位南大教师转给我一封信，让我对他写的《三国演义系统中的诗词》一文提出意见。尽管我对《三国演义》的诗词毫无研究，并且即将赴日本东京大学任教，但是铁生同志诚恳谦逊之情很使我感动，便提笔写了几句不怎么高明的话语。我建议他整体研究《三国演义》的诗词，这可能是一项填补空白的工作。谁知1992年7月，铁生推出《三国演义艺术欣赏》，1994年5月，《三国演义诗词鉴赏》全部杀青，可见他绩学日进，不能不让人敬佩他勤奋刻苦的精神。

我不清楚小说中插入诗歌的体制始于何时，就小说而言，唐代小说中就已有大量的诗歌成分。这可能同中国诗歌发展到唐代已是高峰期有关。明人杨升庵说：“诗盛于唐，其作者往往托于传奇小说神仙幽怪以传于后，而其诗大有妙绝今古，一字千金者。”（《艺林伐山》卷一七）何况作传奇者多是士林才子，传奇所写大抵情钟男女的悲欢离合之事，作家不免驰骋自己诗笔，代人物自题自吟、赠答酬对，抒发男女主人公爱情的痛苦与甜蜜的情绪，或让文中的鬼魅以诗自寓，为小说创造了抒情氛围乃至小说的诗化。这种笔法对于后代的才子佳人和白话小说的体制，都产生过影响。

可是，为长篇章回小说，特别是历史小说提供叙事模式的是被王国维先生称做通俗小说之祖的唐变文和宋元话本（王国维《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变文与宋元话本的韵散相间、诗文结合的基本架构，描写景物、场面、人物时常常用骈丽的诗句加强渲染烘托，类似开篇诗的押座文与散场诗的解座文，无疑是后来说书体小说固定的格式。唐代咏史诗也为历史小

说提供判断的资料，因此，明代早期历史小说填塞了过多的诗歌，如《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隋唐两朝志传》、《唐书志传通俗演义》等等，就引用了唐胡曾、罗隐、周昙，明初周静轩、杨丽泉的咏史类诗歌。只是明末清初以来，历史小说逐渐摆脱宋元讲史小说的格局，向小说化小说转折，于是明袁于令的《隋史遗文》，清金圣叹删改本《水浒传》，毛宗岗父子评改本《三国演义》，才全删或部分删剪小说中的诗词，力求文气贯通，保持小说节奏的和谐统一。

话得说回来，只要是诗词与情节和人物性格描写密切相关，能表现人物才情风貌的，并不都是多余的。仅以《三国演义》而言，每首诗即是三国历史的一个事件，对每一个事件评判，都显露中国人的历史意识，作家本人的历史观念。事实也是如此，《春秋》那些隐寓褒贬、惩恶扬善、垂训来世的精神，不仅成为历史家遵循的创作原则，也积淀为文人传承不绝的历史道德意识。历史小说家当然也就毫不例外地表现了传统历史价值的判断，而毛宗岗的评改本有着更为浓重的封建正统思想。因此，分析小说中的诗歌成分，必然成为研究《三国演义》不可或缺的角度。这也许是郑铁生同志之所以创作《三国演义诗词鉴赏》的目的。

郑著分释词、说明、赏析三部分。尽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注释的准确与否，赏析的捕捉是否得当，肯定会有商榷之处。然而，他毕竟为读者贡献了一部有价值的书，初学者乃至研究者藉此可以更深刻地把握《三国演义》，更何况如今没有一部全面分析《三国演义》诗词的专著，铁生同志无疑是做了开拓性的工作。

且不说释词中对艰涩的词语，鲜为一般读者所知的典故，做了明确通俗的解释。单论赏析部分，以毛本为本同嘉靖本比较，析其异同，再论证每首诗的思想内涵和艺术特点，应当说是很全面的。

值得注意的是，铁生同志根据每首诗的不同特点，或者从叙事角度剖析作者的观点、小说中人物的视点，如《咏史》；或是从诗的渊源发开去，论析诗转借的真意，如《唐妃诀别歌》；或是探讨封建知识分子的性格，如《蔡邕之死》、《祢衡之死》；或是客观地辩证历史人物，如《割发代首》；或是考究史书情节与小说中情节的变异，如《袁术之死》；或研讨毛宗岗对嘉靖本的修改，分析作家强调的侧重点，如《吉平之死》、《董承之死》；或是从一个细节的增减看作者的创作意图，如《老天何故纵奸雄》；或是分疏各个谋士的性格特点，如《郭嘉之死》、《田丰之死》、《沮授之死》、《荀彧之死》；或是揭示人物心理与人物之间的矛盾关系，如《题壁诗》、《周瑜唱歌词》、《义释曹操》、《七步诗》；或是阐述人生哲理，如《大梦谁先觉》……等等。

总之，《三国演义诗词鉴赏》旁征博引，发掘隐微，是一部难得的著作。我相信铁生同志正英年敏锐，如就此坚持下去，深入钻研，腹笥日丰，必将会有更多的著述问世。



前言

中国古典小说名著《三国演义》，以雄浑的历史画卷、活脱的人物性格、博大的社会意蕴，赢得了古今中外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喜爱，其蕴含的诗词便是适应当时人们的文化心理和审美情趣而形成的。但在当代的读者群中，却少有人对《三国演义》诗词问津，这种文化现象反映了民族传统的文化结构和审美习惯正在发生变异，每个时代都有自己新的审美追求，而且自觉不自觉地影响一代人的欣赏导向。

但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是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的。历史愈久，积淀愈深，也就愈能显示生活在这种文化大背景下，由于民族文化潜移默化的浸润和滋养，而产生出民族的趋同性和凝聚力。它在群体或个体间的传承和衍进，总是体现出极大的传统势力。许多长期囿于书斋文化圈内的东西，一旦被大众传播媒介所宣传和介绍，便很快出现雅俗共赏、口耳相传的局面。《红楼梦》诗词中一支《枉凝眉》被谱写成美妙动人的主题歌后，几乎成为老少皆爱、人人吟唱的歌曲。再如《三国演义》电视连续剧的主题歌，“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这种文化现象有力地证明，“趋同”与“变异”一旦两者相撞击、交融，激活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便会产生和创造出具有崭新面貌的民族文化优秀成果。新时期对《三国演义》的研究和传播正以雨后春笋挺拔而出之势，面向国人，走出国门。《三国演义诗词鉴赏》的问世，将有益于这部伟大著作本身所具有的深邃而丰富的文化内涵在新时期得到弘扬。



诗词在《三国演义》几个重要的版本中的数量都很多,其中嘉靖本有三百四十四首;李卓吾评本有四百零九首。清代毛宗岗修定《三国演义》时,将叠床垒架、俚鄙可笑的诗词尽皆删除,又取唐宋名作以充实,还有二百零六首。解放后整理出版的普及本《三国演义》是以毛氏本为底本,依旧保留原有诗词。这些诗词在《三国演义》整部书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像章回中的“文眼”一样,涵盖了近百个历史人物的思想性格,数十次历史事件的史评史论;包容了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如儒道释思想的交融、军事谋略的展示、历史地理的沿革、俗谚口碑的流播、传统道德的弘扬、以及占卜神怪鬼文化;表现了小说家的艺术构思,运用诗词的艺术特质刻画人物性格、推动情节发展、构建叙事视角等。这一首首韵语犹如一块块化石,当揭开其鲜活而灵动的内容后,仿佛置身五光十色、绚丽多彩的艺术之宫,别有洞天。对《三国演义》诗词注释和赏析,实际上是一种阐释的过程,在阐释每一首诗时,都站在把诗词同整部书中的情节、人物和小说家叙事角度的内在联系综合成一个整体的高度来审视。每诗虽各自成篇,但举小贯大,推末至本,点点滴滴都源于一个叙事思想,聚则一贯。这样讲并不是强调《三国演义》诗词艺术性有多么高,思想性有多么深,而是说它自有属于自己的特色。大致归纳为艺术功能、人生意蕴和审美价值三个方面。下面分而述之:

第一,《三国演义》诗词的艺术功能

二百多首诗词作为《三国演义》叙事艺术的因素,散见在叙事结构之中,考察其艺术功能的一个基本点,便是看其是否成为小说叙事结构的有机因素;是否能发挥不同于叙事文字的独特作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作为情节因素,即诗词成为小说中的人物或情节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刻画人物性格和推动情节发展起到了独特的艺术作用。如:汉少帝咏诗一首《嫩草绿如烟》、蔡瑁《题壁诗》、曹植《七步诗》等。这些诗歌都是作为人物的语言,即以咏诗的形式表达了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个人独特的思想情感。其诗



的意象或意境,是小说中人物思想性格的剪影。曹植《七步诗》表现的相煎之态,正是曹丕迫害其亲兄弟的写照。《潜龙诗》表现的幽困之兆,正是魏帝曹髦在司马昭挟持下做傀儡皇帝倾吐的心声。诸葛亮吟诵《铜雀台赋》则是小说“智激周瑜”情节的需要,成为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总之,都是按照人物性格发展的脉络,依据情节发展的必然逻辑去设置诗词的。像这些作为人物或情节的有机因素的诗词在《三国演义》中为数不多,但它所代表的艺术追求,则是中国古典小说运用诗词的表现手法的发展方向。另一是作为非情节因素的诗词,在《三国演义》中艺术功能主要体现为叙事者的议论。小说家以全知全能的外视角的身份讲述故事,这种超越历史时空的外视角叙事方式,并不是小说家随意采取的,而首先决定于小说的题材、内容和生活容量。像《三国演义》如此宏大而绵长的时空结构,历史人物众多,情节线索复杂,场面转换频繁,只有用全知全能的外视角才有可能把三国演进的各个局部有机地组织起来。世界文学史中那些规模宏大的史诗式的作品,也都是采用外视角来叙述。这就决定了小说家能够不时地插入诗词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进行评论。这是原因之一。其次是中国历史小说深受正史的史评、史论的直接影响。史书中每有论赞以直接表述叙事者对某一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述。嘉靖本《三国演义》还保留着在情节当中叠床架屋般地插入《三国志》、《后汉书》对四十五位历史人物的“论”、“赞”、“评”。这些同大量的诗词一样,都是叙事者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议论,但这样大量的议论文字,不能构成有机因素进入小说的艺术系统之中,破坏了情节的整合性。毛宗岗在修定《三国演义》时,毫不可惜地加以削除。从形式上似乎单纯些,而实质是将史评和诗词融合到了一块,用诗词的意象的丰富、意境的深远、意蕴的丰厚来表达史家见识。

第二,《三国演义》诗词的人生意蕴

担负叙事者外视角议论的诗词,虽然一点一滴地闪烁着小说家的哲思,但单篇欣赏时,很难发现令人感奋的东西。当将一首首



地汇总到一起,便发现它们从无序到有序,形成了系统,流淌着人生的意蕴。仿佛初春来到茫茫的草原,“草色遥看近却无”,但放眼四望,大地一片新绿,像是铺上了绿茸茸的毯子,昭示着春天的气息,勃发着生命的力量,令人振奋不已!这些诗词可以梳理成三个子系统,这就是“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志在兼济、情在独善的价值观;贤君明相、忠义节烈的政治伦理观。这些子系统之间的协调配合,形成一个人生目标追求——儒道互补的心灵建构。透过诗词意象、意境和由此而产生的抒怀,让读者重新回味曾经是活脱脱的血与火的历史场面,在艺术享受之中去感情那博大深邃的人生意蕴。

其一,“天人合一”的观念在诗词中多处流露,而且明示天命不可违,人生的作为和历史的运作都受制于天命。如小说的结尾描写三国归晋,做了总结性的评述:“纷纷事世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诸葛亮六出祁山,设计上方谷烧司马懿父子,结果天降大雨,使其绝处逢生。“谷口风狂烈焰飘,何期骤雨降青霄”,表达了一种“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无奈。司马炎禅魏,又评论道:“魏吞汉室晋吞曹,天运循环不可逃。”这些不仅说明如何表达出天命观,而更重要地是引发我们思考“天人合一”的思想在汉代,儒家和道家思想互相对立、互为冲撞的结果,找到了二者互补的思想和理论基础。儒家强调“人为”,道家崇尚“自然”,这对抗的格局在汉代为“天人合一”的思想相统一。也就是说人与天共同遵循着一种运行准则。用董仲舒的话说:“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同而通理。圣者法天,贤者法圣,此其大数也,得大数而治,失大数而乱。”整部《三国演义》描写治乱都遵循这一思想。它修正了道家“无为而治”、崇尚“自然”的极端的一面,纠正了儒家“人为”没有客观的规范和依托,使之“自然”与“人为”都纳入了天人共同遵循的一种运作准则之中。从而使儒道互补建立在“天人合一”的理论基石上向前发展。

其二,天人共同运作的准则称之为“道”。这个“道”既可以代表天意,受制于运数和天命,又是人为的创造境界。“士志于道”成



为封建知识分子的价值追求,但谁都无法改变运数和天命如影随形地制约,具体表现为“时”与“位”。“时”指机遇,如诸葛亮好友石广元所唱:“壮士功名尚未成,呜呼久不遇阳春!”“位”指地位,由士而仕是志于“道”的前提。那么如何协调“时”与“位”对于士的困扰,于是一种儒道互补的心理机制使封建知识分子找到归宿,恪守“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信条。《三国演义》诗词中最集中表现志在兼济的忧患意识和情在独善的心理定势,如“诸葛出山”设置的十几首诗词。小说描写刘备三访隆中,听到农夫、诸葛亮的好友、弟弟及岳父所唱的歌,尽管每一首的侧重点不同,但都交织在儒道共存、儒道互补的心态上。虽然在不同的时代不同性格的封建文人中表现各异,但作为封建文人深层心理的积淀却是共同的。只不过诸葛亮是儒道互补心灵建构最完美的模式,“淡泊而明志,宁静而致远”。从小说艺术构思去审视,这些唱词既披露了诸葛亮好友们的矛盾心态,又从侧面映衬了诸葛亮从隐居到出仕的心理正经历着一场风暴。笔墨虽泼洒在他人身上,而神韵却凝聚在诸葛亮的心灵上。

其三,历史学家评判历史的视野,更多地考虑的是对历史进程的作用和意义,而较少顾及具体的道德评判。而历史小说家则不同,在反映历史真实的同时也评判道德是非,而且叙事者主体意识越强烈,发现道德是非的眼光越敏锐。《三国演义》诗词中倾注意论成分最多的就是道德评判。在君臣关系上,歌颂的明君贤相,最突出的是刘备和诸葛亮,如赞颂刘备:“天下英雄独使君”;“西川独霸真英主”;“临难仁心存百姓”。如赞美诸葛亮:“专待春雷惊梦回,一声长啸安天下。”“如公全盛德,应叹古今无!”“三顾频频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歌颂总是和特定的历史色彩相统一,即“拥刘贬曹”,说到底“拥刘”是拥明君,“贬曹”是反暴君。在主臣关系上,讴歌忠义节烈。包括:①忠于汉室,反对权奸。如赞王允:“英气连霄汉,忠诚贯斗牛。”赞董承:“忠贞千古在,成败复谁论。”赞马腾、马休父子:“父子齐芳烈,忠贞著一门。”②各



为其主,忠贞不二。如赞关羽:“忠义慨然冲宇宙,英雄从此震江山。”赞赵云:“青史书忠烈,应流百世芳。”赞张任:“烈士岂甘从二主,张君忠勇死犹生。”③义字当头,行为准则。如赞刘、关、张:“桃园一日兄和弟,俎豆千秋帝与王。”赞诸葛瞻、诸葛尚父子:“节义真堪继武侯。”赞许家三客:“许客三人能死义,杀身豫让未为奇。”④女中豪杰,殉身取义。如赞糜夫人:“拼将一死存刘嗣,勇决还亏女丈夫。”赞徐氏为夫报仇:“才节双全世所无”,“不及东吴女丈夫。”赞马邈夫人:“可怜巴蜀多名将,不及江油李氏贤。”无论是对明君贤相的颂扬,还是对忠义节烈的讴歌,都是随着“天人合一”哲学理论系统的建立,表现了“人与天地参”的思想。实现“人与天地参”的起点是修身养性,进而必须依循天地运行之则,达到道德上的自我实现。这实质上是综合了儒道所采取的追求方式,先道后儒,儒道互补,成为建构心灵世界的一个重要范式。

上面透过历史的现象,看到伴随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人们以儒道互补的思维方式,完成了心灵建构和精神演进的艰难历程。三国历史人物的典型,是人格力量、传统道德、民族精神的承担者,他们的性格和心理是经过几个世纪的积淀而造就的。小说家从他们身上折射出的东西,可贵就在于让我们洞悉于民族传统文化和心理结构相交融而形成的发展历程。因此说,并不能用简单的肯定与否定来看待《三国演义》诗词的意蕴。

第三,《三国演义》诗词的审美价值

作为通俗小说选用的诗词,它考虑的首要问题是通俗易懂。在小说人物命运的生死关头,或是事件成败的关键时刻,加进一些诗词进行评赞,和听众的心理相撞击,与听众的感情相交流,正是“话须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胡曾的咏史诗在晚唐算不得上乘之作,只因一“通俗”,二“关风”,即风化问题。所以当时在民间就广为流传,还被作为儿童教材,普及于乡间。其诗能得到民间的认同,这很值得重视。大概正是这个原因,古代历史小说很喜欢引用胡曾的诗,《三国演义》借用胡曾的诗就有六首。这一现象